

时评

祝贺莫言获得“传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的获奖，不仅提升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自信，更增添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文学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世界上

的影响，毫无疑问会增强中国文化的辐射力，这对于在国际文化传播格局中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来说，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金岭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有种种“传说”，比如说老舍、沈从文等都曾与这个奖擦肩而过，诸如此类的说法，让人感觉这个奖离我们遥不可及。

如今，中国本土作家莫言终获“传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圆了几代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如此，莫言

获奖，超出文学范畴的意义或许更大。

莫言的获奖，无疑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获得了和世界对话的新基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诺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次真正的正视。获奖的虽是莫言个人，但他代表着整个中国作家群体所能达到的高度。

和莫言同时代的作家们，他们在创作上各有成就，有许多作家都和莫言一样，在海外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力。此次莫言获奖，其影响会辐射到许多有实力的作家身上，将从总体上扩大中国当代作家的世界影响力。可以想见，未来将有更多中国优秀作家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作家的总体影响力会较以往有实质性的提高。

莫言的获奖，不仅提升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自信，更增添了我们对自己的自信。文学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毫无疑问会增强中国文化的辐射力，这对于

在国际文化传播格局中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来说，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这次莫言获奖，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标准和中国本土文化互相包容的可能性，这种不同文化直接交融的开放氛围，更能培养一个民族包容大气的文化品格。有了这种品格，我们会有更自信从容的心态面对不同文明。我们追求的那种“中国气派”，没有这种自信从容，是很难涵养出来的。

莫言的获奖，增强了中国作家和外界对话的能力，

也增强了中国文化和世界对话的能力。最能代表这个能力的，是各民族的文化精英，尤其是世界级的文化精英，是沟通不同文明的最好媒介。对于近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文明交往来说，无论是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认识，还是其他国家民族对中国的认识，相当地程度上是通过各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实现的，比如托尔斯泰、歌德、鲁迅等等。他们是沟通不同文明的最好媒介。文学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再也没有比通过文学

作品更能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美好心灵的途径了，我相信，对外国读者来说，通过莫言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这是一般教科书很难代替的。

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但应该是经济意义上的，还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经济大国如果文化上影响力甚微，那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希望莫言的获奖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中国应该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化精英，这将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又一个标志。



事件观

受伤车主状告公安讨的是“公道”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据媒体报道，“9·15”西安反日游行中受重伤的日系车主李建利委托律师，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起诉西安市公安局“不作为”。

李建利状告西安警方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突兀，毕竟重伤李建利的嫌疑人与警方无涉，而且也已归案，李建利似乎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在其他地方的游行中也发生过打砸行为，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损害的也不只李建利一人，但是能像他这样依法维权的并不多，尤其是敢于追究权力部门责任的。姑且不论李建利最终能否胜诉，他的一纸诉状确有重大意义，将再次提醒一些权力部门，在公民权利受到损害时，

任何疏忽和懈怠都有可能产生法律责任。

《人民警察法》明文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也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从西安当天的游行情况可以推定，公安机关的管理方式和效果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原告认为“在车辆被砸自己被击伤之前，打砸抢事件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原告并没有看到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或者说出现的极少量警察根本不足以制止打砸抢违法行为”，这样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更让公众难以接受的是，在全国舆论的关注下，犯罪嫌疑人

迟迟未能落网。在个别地方的反日游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公民理性与否的问题，或许还有公安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问题。在肯定了大多数人的爱国热情时，个别地方的公安机关显然不自觉地放宽了执法的口径，或许在一些警察看来，打砸日系车只是“爱国青年”的一种“不理性”，而忘记了自己的法定职责。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希望西安警方能积极对待这场诉讼，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公民将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参加集会和游行，也有助于培养公安机关在执法中的理性，既不能滥用权力，也不能“不作为”。推动社会的法治文明，离不开权力机关和公民的共同参与，这才是李建利状告西安警方的普遍意义。

期待“任建宇案”助推劳教制度改革

□汤嘉琛

近日，备受关注的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劳教申诉案，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去年4月至8月，任建宇在QQ空间和微博上转发或发表百余条批评性言论，被判劳教两年。

继六年前的“彭水诗案”之后，同样是因言获罪的“任建宇案”，再度让重庆彭水成为舆论焦点。只不过，“彭水诗案”的关注焦点是“诽谤罪”，而“任建宇案”的关注焦点则是公众诟病久矣的劳动教养制度。“任建宇案”的声援者希望，这一案件能得到

公正处理，并成为助推劳教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节点。

现行的劳教制度，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相关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不少问题，此前已广受争议。

纵观近年引发热议的劳教案，一个尤其值得担忧的趋势是，有些地方政府将劳教当作了打击上访者的工具。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收容遣返中转站被殴致死，引发全民大讨论，最终为积弊重重的收容遣返制度画上了句号。如今人们谈论劳教制度的舆论情势，与当年激辩收容遣返制度存废之时如出一辙，很多人都希望，现

在备受关注的“任建宇案”，以及此前永州“唐慧案”等劳教案，能够像当年的“孙志刚案”一样，成为改革劳教制度的催化剂。

公众的期待，并非是一种奢望。几天前，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谈及劳教制度时就表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官方的积极表态，或许能够让“任建宇案”得到公正处理，也让公众对劳教制度改革多几分信心。

别把“房产政委”仅当成个案

□于治国

纪检监察部门初步调查，网民反映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1处房产情况基本属实，并且，蔡彬过去按规定向组织递交的家庭财产申报所报告的房产数量与此有一定距离。当地纪委已成立调查组，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发布。(本报11日A19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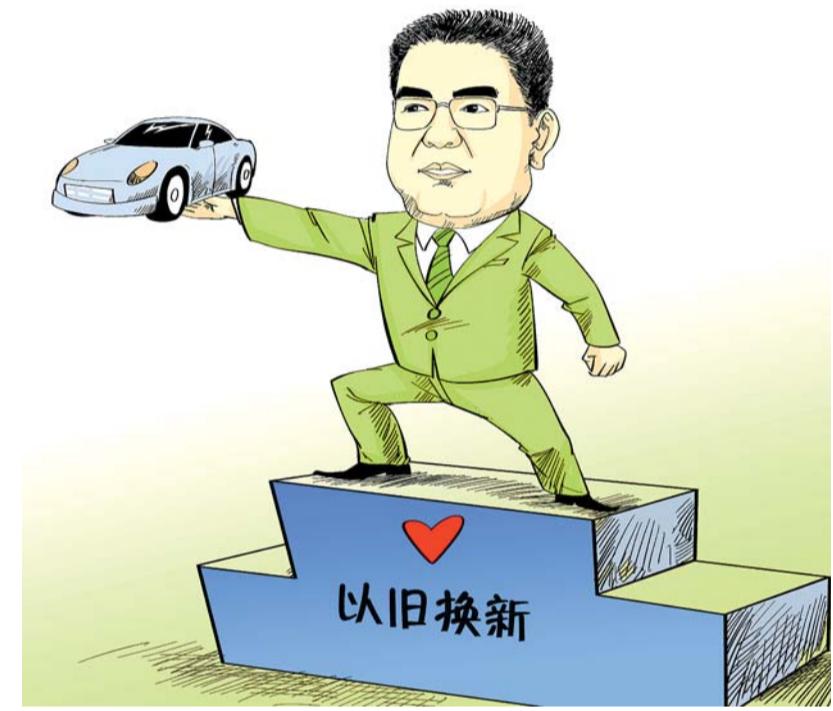
拥有21套房产的蔡彬，似乎又是一个传奇、一个神话。以他和妻子的工资收入与21套房产相比，这个比例

出奇地不对称。网民举报如此有力，实在是让相关监管部门难堪，更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如此不经查？为什么这些落马者素质如此低劣、如此胆大妄为、如此无法无天？这样的人怎么就能平步青云、到达如此重要岗位？相关部门对这样的人进行提拔时，考察得真的很全面、很彻底、很到位吗？

回顾近年来因被网上举报而落马的官员，数量不在少数，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正常又不正常。说它正常，是因为网络发展

的进步，给了民意以更多表达的机会，说它不正常，是因为这种方式不必经过一些繁琐的程序、手续，而且比其他方式影响更大、效果更好，尤其是更能引起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的重视，突破了传统举报方式的局限，往往会给相关部门一个突然袭击。

笔者相信每一个被查处的腐败干部都是个案，但是，一个案之中，我们隐约地感觉到了监督的无力、个别党员干部自我放纵的可怕。这样的个案，真的到了不能再有的时候了。



高调换车



勾犇/画

10日下午，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南京举办现场活动，对因钓鱼岛争端被砸的日系私家车以旧换新。陈光标在换车现场唱歌并登上车顶表演。

近年来，陈光标的慈善活动频繁亮相于媒体，包括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发放现金、在贵州派发猪羊等。不过一直以来，公众对陈光标的行善方式褒贬不一。(据《新京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若不能不计毁誉改革将寸步难行

>>媒体视点

《人民日报》10月11日发表评论《改革开放，永葆探索创新的朝气》指出，今天的中国，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只有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我们才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将先辈们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评论说，今天的中国，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改革越往前走，人们对它的期待越高，遇到的困难也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过去普调一级工资、粮价上涨几分钱，老百姓就欢喜地；现在搞医保社保，

成百上千地投入，却仍有人抱怨是“太平洋里磕鸡蛋——这哪算做蛋汤”。过去建一个工厂带动就业、增加税收，大家无条件欢迎；现在则要面对种种质疑：会不会挤占耕地，会不会破坏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搞改革，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没有不计毁誉的心理素质，没有坚不可摧的创新意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评论指出，更为复杂的挑战在于，随着改革走向深入，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

社会多元带来的利益分化，时常令改革者面对“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难。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舍”，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靠动员，改革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为一种你来我往的博弈。面对转型期社会这些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我们既要有大刀阔斧的果敢决断，又要有机智细致、周密安排。

继续深化改革，一个显

著的不同在于：前辈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我们的财力增强了，实力提高了，对规律的认识加深了，方方面面的条件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能不能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是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着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评论最后说，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只有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我们才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将先辈们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创造新的辉煌。

■本报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